

论中国近代早期的三个典型改良主义思想家^①

关 威

(惠州学院 政法系 广东 惠州 516007)

【摘 要】在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群体中,洪仁环、容闳、冯桂芬具有典型性。三人都较早提出过比较系统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改良方案。由于三人的政治生涯不同,三人思想的社会影响也有区别。洪仁环的思想昙花一现,对太平天国没有太大的影响;容闳的思想作用于洋务派,在推动中国近代化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冯桂芬既是洋务派的重要理论家,又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实践者,其作用更为明显。

【关键词】洪仁环;容闳;冯桂芬;改良思想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12)03-0044-04

19世纪40年代初,外国列强的大炮打开了中国国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激起了中华民族的英勇反抗。另一方面,外国的资本主义文化也随着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分解和催化的作用,因而使中国社会的思想界出现了一次跃动——即产生了人们所称的“睁眼看世界”的倾向。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是这种思想的杰出代表。特别是,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对反对侵略与学习西方文化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诠释,在一定意义上概括出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最本质的方面。但是,这种新的思潮没有得到最高当权者以及整个社会舆论的响应,中国在旧的秩序下按部就班地度过了近代初期的20年时间。

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动荡。一方面,太平天国起义军正在与清政府军队进行殊死搏斗;另一方面,英、法侵略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因此,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又错综复杂,中华民族处在一种十分痛苦和艰难的境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有识之士立志向西方寻找救国方案,探索摆脱危机的道路,于是出现了一些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洪仁环、容闳、冯桂芬就是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有代表性的人物。洪仁环、容闳、冯桂芬的思想有许多共同点,

但是三人的政治立场、地位、作用明显不同,三人的思想也有不同的归宿。这其中,有哪些区别与联系,有哪些偶然与必然呢?本文对此试作探讨,以求教正。

一、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环的改良思想

洪仁环(1822—1864),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拜上帝会最早的信徒之一,曾经为筹建太平天国做出重要贡献。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洪仁环因为没能赶上起义队伍,于1852年4月避居到香港。在此后的几年中,洪仁环与一些外国传教士频繁接触。他曾向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口述《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他还接受韩山文的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在同外国传教士交往的过程中,以及在香港的所见所闻中,洪仁环学习了许多资本主义文化,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成为中国传统儒学、西方文明、基督教的综合体。1859年4月,洪仁环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投身于太平天国斗争。不久,洪仁环被洪秀全封为“干王”,总理朝政,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领袖之一。这一年年底,为了向天王陈述治国主张,洪仁环写出了著名的《资政新篇》,全面提出了他的革新思想。《资政新篇》分为“用人”和“设法”两大方面,“设法”又分为“风风类”、“法法类”和“刑刑类”。其中“法法类”的内容最多,具体提出了20

^① [收稿日期] 2012-03-20

[作者简介] 关威(1956—),男,辽宁本溪人,广东省惠州学院政法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多条关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革措施和建议,体现出洪仁玕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是《资政新篇》的中心。总体看来,《资政新篇》反映和代表了洪仁玕的宗教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基本方面,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改良方案之一。

二、第一个毕业于西方的大学生容闳的改良思想

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南屏乡(今属珠海)人。容闳少年时在澳门一所外国教会学校学习。1847年,他随美国传教士布朗赴美留学,于18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毕业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生。容闳在留学期间一直关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希望“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32}。容闳大学毕业后拒绝为美国对华传教服务,于1855年回到中国。容闳是抱着救国热情回到祖国的,他迫切地希望将自己学到的知识和对社会发展的设想应用于中国,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容闳回国后,先后在广州美国领事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担任过一般职员。这期间,容闳目睹了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恶劣行径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心中产生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回想起他刚回国时在广州看到两广总督叶名琛残杀数万名天地会起义军的血腥场面,容闳对清政府的认同感减少。这种认识上和感情上的变化,促使容闳于1860年冒着风险来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同行的有数名外国传教士),容闳说自己此行的目的是“探太平军内幕”。显然,他是想进一步了解太平天国的治国方针及发展前途。容闳受到了洪仁玕的热情接待。他俩1856年在香港曾有过一段交往,旧友重逢,自然十分亲切。在介绍了太平天国的基本情况后,洪仁玕问容闳“对于太平军之观念若何?亦赞成此举而愿与之共事否?”^{[1]73}显然,洪仁玕对容闳比较赞赏,并有挽留之意。容闳于是向洪仁玕提出七条建议:(1)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2)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3)建设海军学校;(4)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5)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6)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7)设立各科实业学校^{[1]73}。这就是容闳所说的所谓七条“富强策”。这些建议

虽然字数不多,但是范围广泛,主旨明确,它体现了容闳的资本主义改良思想,因而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改良方案之一。

三、洋务派理论家冯桂芬的改良思想

冯桂芬(1809—1874),江苏吴县人。道光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鸦片战争时期,冯桂芬与林则徐、姚莹、张穆等人多有交往,讲求经世致用之道。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后,冯桂芬在苏州组织团练与太平军对抗。苏州被太平军占领后,冯桂芬逃至上海。1862年,受曾国藩的派遣,李鸿章率领刚刚组建的淮军驰援上海。冯桂芬是此次事件的参与者。随后,冯桂芬在上海入李鸿章幕府,参与淮军军事决策,成为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冯桂芬在军事上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但他的长处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冯桂芬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概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对西学的特点和作用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结合中国的动荡和落后现实,冯桂芬形成了学习西方文化、加快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这种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代表作《校邠庐抗议》中。《校邠庐抗议》一书成于1861年,全书40篇,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其中心思想是主张改革政治和向西方学习。冯桂芬认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校邠庐抗议》一书提出了改革中国的具体建议,包括公黜陟、汰冗员、许自陈、易吏胥、省则例、兴水利、改土贡、筹国用、收贫民、改科举、采西学、制洋器、善驭夷等方面。书中还就学习西方文化提出了一条影响深远的原则,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国富强之术”,这就是后来洋务派广泛认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对近代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冯桂芬思想的重要方面是“西学为用”,即学习西方文化,加快中国发展。他是封建统治阶级中主张学习西方的典型人士,是洋务派的激进思想者之一。

四、三者改良思想的比较和分析

将洪仁玕、容闳、冯桂芬的改良思想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三者的基本宗旨是大体一致的。主要表现在:政治上主张建立新式的国家政权,并辅之以各级社会行政组织,上通下达,提高行政效率,保证新政的施行;经济上主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商品经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上主张实行“实业教育”,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以改变中

国旧的社会风俗。因此可以认为,洪仁环、容闳、冯桂芬是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中的重要人物,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虽然洪仁环、容闳、冯桂芬的思想同属于早期改良主义范畴,但他们三人对由什么人来承担改良任务的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这是由许多复杂因素影响和决定的。

洪仁环在政治上是太平天国农民领袖,属于农民阶级,他的这种阶级地位和立场,按照常理似乎不应该具有资本主义改良思想。但是,他毕竟有了这样的思想,这主要是由于他在香港数年接触资本主义文化的特殊经历,使他的思想事实上与太平天国农民的思想有了明显的差别。洪仁环身上表现出的这种两重性,正是当时动荡时代的烙印。《资政新篇》的提出,或者可以说是洪仁环受天王洪秀全知遇之恩,并为了向众人表现自己的见识和才能而提出的。它其实只反映出洪仁环本人的思想,并不代表太平天国其他领袖的思想,不代表太平天国农民的思想。当时洪仁环本人已经受到太平天国许多将领的冷遇,他的改良思想显然也不会有知音。因为如此,如果把《资政新篇》视为太平天国后期的纲领,恐怕与实际有些不符合。同样,如果根据《资政新篇》的提出,认为太平天国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也难以令人信服。太平天国虽然带有一些近代的、基督教的特点,但它毕竟是一场旧式农民起义。这种旧式的、封建式的农民起义与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没有必然联系。再说,洪仁环来到天京时,正是太平天国处于十分困难境地的时候,太平天国将士们正浴血奋战保卫自己的政权。对于主持朝政的洪仁环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布置军务,维持太平天国的生存。如果他无法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他的改革设想就只能成为空中楼阁,没有载体,无法实施。历史已经证明,太平天国后期的形势是无法逆转的,洪仁环显然没有回天之力,他的政治生命随着几年后太平天国的失败而结束了,这是十分可惜的。然而,通过《资政新篇》表现出的洪仁环的改良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容闳作为一个从外国毕业回国的知识分子、“白领人士”,对西方文化的接触是最直接的,认识应该是最深刻的。当时容闳个人的生活境遇是比较优裕的,虽然如此,容闳在清政府与太平天国激

烈对垒的形势下冒着巨大风险来到天京,应该说是非常有勇气的。容闳在提出“富强策”时特地向洪仁环表示“倘不以为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1]74}这似乎说明容闳起初是同情并打算服务于太平天国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分析,他对太平天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他觉察到太平天国有不可克服的弱点:一是“自天津败北,兵力缩减。良由其所招抚,皆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以此加入太平军,非独不能增加实力,且足为太平军之重累”;二是“迨占据扬州、苏州、杭州等城,财产富而多美色,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况愈下。盖繁华富丽,固足以消磨壮志,而促其灭亡也”^{[1]81}。因此容闳判断“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1]75}有了这样的判断,容闳觉得自己留在太平天国是无法施展抱负的,也是没有前途的。于是他谢绝了洪仁环的封赏和挽留,离开了太平天国。此后不久,经人介绍,容闳来到安庆,受到湘军统帅曾国藩的接见。容闳觉得曾国藩有见识,又善于用人,便视为知己,再次提出自己的改良方案,受到曾国藩的重视。当时曾国藩正准备建设兵工厂,于是委派容闳赴美国购买工作母机。容闳欣然接受了任务,赴美国采办机器,购买回来的机器安装在刚兴办不久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会见曾国藩是容闳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机,从此他开始了与洋务派多年的合作。容闳提出的改良方案的许多内容陆续在洋务运动中实行,尤其是容闳提出的“留学计划”,在丁日昌、曾国藩、李鸿章的努力下,清政府于1872年起连续4年向美国派出中国近代第一批官费留学生120名,并且以容闳为副监督,开一时风气之先,培养出近代中国一批专业人员,在近代教育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开创性意义。由于容闳的思想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一定影响,以及容闳本人实际参加了洋务运动,所以,他的改良方案在客观上便具有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作用。

站在清政府的角度看,洪仁环是“对立面”,容闳是“边缘人”,冯桂芬则是“体制内”的人,是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冯桂芬长期居洋务派大员李鸿章幕府,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重视。李鸿章称赞冯桂芬“好学深思,博通今古,喜为经世之学”^{[2]346}。正是由于与李鸿章的非同一般的关系,所以冯桂芬关于社会改革的主张能够比较快地反

映在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实践活动中,对社会改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还应看到,冯桂芬既是洋务派理论家,同时也是改良主义思想家,也具有两重性。说他是洋务派理论家,是因为他的思想主张反映了洋务派思想的较高水平,其中许多已经在洋务运动中得到实行,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说他是改良主义思想家,是因为他并没有局限于洋务派的思想水平,他的见识比洋务派高出一筹,他的思想的某些方面其实属于资本主义改良思想范畴。

五、三者改良思想的必然性及其社会影响

上述三个人物的政治派别和立场是根本不同的。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农民领袖,容闳是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的自由知识分子,冯桂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下级官员。但是,他们的思想主张却有着明显的共同之处,即提倡学习西方文化,改革中国政治,促进中国社会发展。这显然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经历了长期闭关锁国,经济社会发展迟滞,面临严重内忧外患的中国,到了19世纪60年代,再也不能按部就班继续下去了,必须顺应时代要求,走向改革和开放。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避免进一步沉沦。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这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关于这一点,钱钟书先生曾深刻指出:“‘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3]序

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洪仁玕失去了发挥政治理想的条件,其改良思想的实际影响因而受到限制。而容闳和冯桂芬则能够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洋务派大员施加影响,起到“参政”作用,所以容闳和冯桂芬改良思想的实际影响显然相对大一些。按照一般逻辑,资本主义改良应该由资产阶级来实行。也就是说,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洋务派,并不是在中国推行具有资本主义特点改革的最佳人选。但当时中国还没有产生资产阶级,不具备这种最佳人选,因此,洋务派就被推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不可替代的、勉为其难的人选。由于洋务派掌握着国家权力,又具有相对开放的意识,

所以他们在当时能够承担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责任,起到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作用。不管怎样,后来的历史充分证明,洋务派的改革措施和开放努力,使中国的内政、外交等许多方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促进了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变迁,促进了文化进步。虽然洋务派自身有不少缺陷,洋务运动的过程和结果也不尽如人意,但是如果没有洋务运动,就不会有近代化的起步,也就难以有后来的戊戌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由于洋务运动与早期改良主义思想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有着不同程度的互动,所以我们有充分理由肯定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经过战乱、动荡和整合,面临新的挑战 and 机遇,要开始新一轮的发展,其基本的和必然的趋向是走向近代化、走向世界。农民阶级思想家的洪仁玕、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容闳、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洋务派官员冯桂芬,虽然政治身份有所不同,但是三人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种必然趋势,提出应对的思路,说明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是难能可贵的。洪仁玕的思想、容闳的思想,其实都可以在洋务派的思想中找到一些影子。一定的思想产生于一定社会现实,而思想一旦产生,必然对社会现实发生广泛的影响。而且,社会变革既需要有产生于社会的先进思想作先导,也需要依赖社会权力的推动。由于洋务派掌握着国家权力,只有他们有条件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把社会改良思想付诸实践。他们这样想了、这样做了,并且取得一定的成绩,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有重要贡献的,也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给予充分的承认和肯定。

【参考文献】

- [1]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2] 欧阳跃峰. 人才荟萃——李鸿章幕府[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1.
- [3] 钟叔和. 走向世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责任编辑: 朱 根】